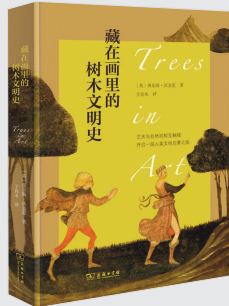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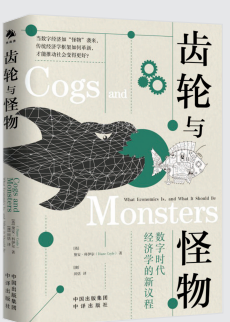


新书掠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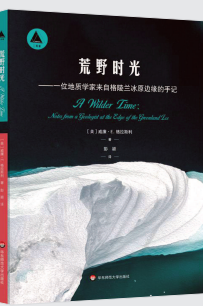
本书从不同角度入手,逐一检视各个时代、各个艺术流派画作中树木与森林的形象,阐释这些形象背后的文化意涵。穿越数百年的葱郁,艺术与自然的相互触碰,反映和隐喻了人类的生活道路。

《藏在画里的树木文明史》
[英]查尔斯·沃金思 著
于肖未 译
商务印书馆
2022年10月出版



主流经济学仍然假设人们是“齿轮”——在特定环境中相互作用的独立主体,但数字经济更像是“怪物”——不受束缚、滚雪球般发展壮大。

《齿轮与怪物:数字时代经济学的新议程》
[英]黛安·科伊尔 著
田恬 译
中译出版社
2022年11月出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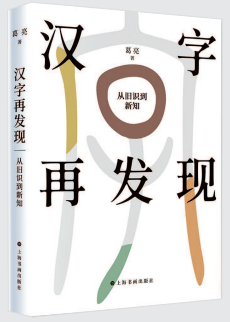
地质学家化身科普诗人,为读者谱写一首关于格陵兰探险的诗歌。荒野在消退,格陵兰冰原在融化,面对这种可悲的失去,人类必须严肃地进行反思。

《荒野时光——一位地质学家来自格陵兰冰原边缘的手记》
[美]威廉·E.格拉斯利 著
彭颖 译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2022年10月出版



进入新世纪以来,随着数字技术、互联网发展和出版单位事业改企业并纷纷上市,中国出版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本书立足正反两方面,深入细致地进行描述、剖析、审问和立论。

《出版的正面与反面》
徐海 著
江苏人民出版社
2023年1月出版



本书立足一手材料,讲解分析汉字源流的正确方法,介绍甲骨、金文、简帛等出土文献的研究进展,力求纠正公众以往形成的似是而非的古文字“常识”,让古文字不神秘,对古文字不神化。

《汉字再发现:从旧识到新知》
葛亮 著
上海书画出版社
2022年10月出版

书人茶话

中国考古学百年历程:从荒野求索到满天星斗

■ 唐骋华

如果说100年前,中国的考古事业是一片荒野,那么今天,已然璀璨的满天星斗了。回望这百余年历程,先贤们正是从荒野出发,筚路蓝缕,融贯东西,不仅在“术”(如考古技术)的方面日益精进,更在“道”(如历史观念)的层面取得突破性进展,从而走出了一条中国考古学的独特道路。对此,近期出版的张泉《荒野上的大师:中国考古百年纪》和岱峻《李济传(修订版)》作了精彩描述,读罢令人心潮起伏,若有所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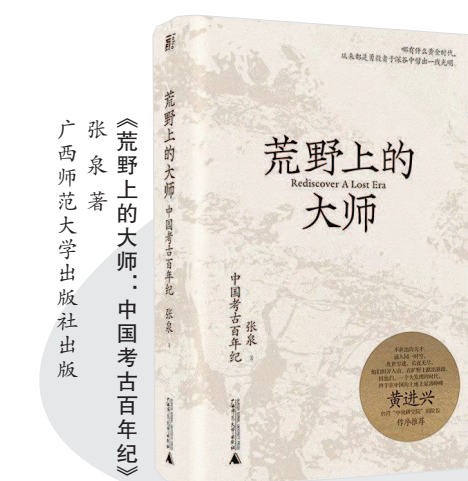
回望“第一铲”:初代地质人的馈赠

1921年10月27日,瑞典学者安特生在河南仰韶村挖下探索中国史前文明的“第一铲”。作为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的标志,在今后的日子里此举将被反复书写。张泉所著《荒野上的大师:中国考古百年纪》让我注意到,安特生是著名地质学家,曾任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地质学教授兼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。1913年,北洋政府创办农商部地质调查所(后升级为中国地质调查所),特聘安特生为矿政司顾问,勘探铁矿,并帮助中国培养地质人才。安特生不负所望,在河北发现大型铁矿,受到嘉奖。

期间,安特生对地下的古生物化石产生了浓厚兴趣,进而延伸到考古领域。1920年,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寻到远古石器和陶片,提议挖掘,得到地质调查所和地方政府批准。仰韶文化就此浮出水面。换言之,中国现代考古学里程碑式的“第一铲”是由地质学家开动的。

无独有偶,安特生团队里还有一名拥有地质学背景的学者袁复礼。袁复礼,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质学硕士,归国后进入地质调查所任技师,并作为中方代表参与仰韶遗址的发掘。而日后主持周口店遗址发掘,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的裴文中等,都是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后加入的地质调查所。如此看来,这个中国第一所地质研究机构,在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轫期同样扮演了关键角色。这自然与创办人丁文江的宏阔视野分不开。

丁文江,1887年生于江苏泰兴,获英国格拉斯大学地质学硕士学位,一生抱持科学救国的信念,并付诸实践。据《荒野上的大师》所述,丁文江白手起家,便是在一片荒原上让地质学这门现代学科落地生根。尤其他为地质调查



《李济传(修订版)》
岱峻 著
商务印书馆出版

所培养的“十八罗汉”,奠定了中国地质学学科的坚实基础。难能可贵的是,丁文江是位“通才”,关心的不只地质学,举凡考古学、语言学、政治学皆入其法眼,而且都能用现代学术的眼光去衡量,屡有创见。难怪挚友胡适夸丁文江是“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”,诚哉斯言。

有这样一位先驱,既是地质学也是考古学的幸运。试想,如果换作只知本专业的专才主持地质调查所,面对安特生“不正业”的考古学兴趣,恐怕将大皱其眉。这“第一铲”能否挖得下去,实难预料。甚至连我国百年考古历程中神一般存在的安阳殷墟遗址,研究轨迹或许也会改变。原来最初主持殷墟遗址的董作宾,学问更接近传统金石学,过度关注甲骨,而对人类遗骸、建筑遗存、先民器物有所忽略。直到李济接手,运用现代考古学的方法发掘,局面才改观。李济为哈佛博士,本行却是人类学,他是在丁文江的鼓励和支持下投身考古学,终成一代大师。

以丁文江的才情,若去国外搞科研,“大师”头衔也是迟早的。但他宁愿牺牲前途,为祖国网罗和培育才俊,奉献一生。丁文江曾向李济自剖心迹,说凭多年努力,“地已耕了,种子已播了,肥料也上得很多了,只待发芽向上长”。以李济、袁复礼、裴文中为代表的中国初代考古学家,正是丁文江这位中国初代地质人悉心栽培的胚芽。他们在苗壮成长。

推翻“西来说”:初代考古人的奋斗

李济从人类学转向考古学,是憋着

股劲的。事情还要从“第一铲”讲起。仰韶文化横空出世,固然打破了西方学者关于“中国没经历过石器时代”的论断,却造就了另一种偏见。原来,仰韶出土的彩陶与中亚安诺文化中的彩陶似乎存在亲缘关系,安特生推论,彩陶工艺是从中亚经西域传入中原的。此后安特生在陕西、甘肃等地发掘了50多处史前文明遗迹,越来越多的证据让他相信推论的正确性,甚至形成了“中国文化西来说”,认为彩陶、石器、青铜、农耕等技术并非中国原创,而是从外部传入。

中国学者自然无法苟同,李济即是其中之一。据岱峻的《李济传(修订版)》,李济生于晚清、长于民初、学于美国,是那个忧患年代典型的中国学者:一方面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,服膺科学;另一方面对西方话语权威深感不满,渴望用掌握的新知击破西方的误解和偏见,重树中国人的信心。李济的博士论文《中国民族的形成》,即运用体质人类学寻找“中国人真正的老祖宗”,进而论证中华文明有相对独立的起源。这已然和“西来说”针锋相对,也为李济听从丁文江建议,“半路出家”搞考古埋下伏笔。

1926年春,李济和袁复礼赴山西考察,在夏县西阴村发现大量史前彩陶。其工艺之精美,远超中亚出土的彩陶,这让李济确信“西来说”站不住脚。西阴村遗址发掘也是中国人第一次主持田野考古发掘,李济又首创“三点记载法”和“层叠法”,奠定了中国考古的基本方法,因此意义重大。李济“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”的称号亦由此而来。

如果说100年前,中国的考古事业是一片荒野,那么今天,已然璀璨的满天星斗了。回望这百余年历程,先贤们正是从荒野出发,筚路蓝缕,融贯东西,不仅在“术”(如考古技术)的方面日益精进,更在“道”(如历史观念)的层面取得突破性进展,从而走出了一条中国考古学的独特道路。

1929年,李济接手殷墟的发掘工作。相比董作宾,李济眼里不仅有甲骨,也有其他文物,并且注重考察地层分布,追寻其演变脉络。1930年,吴金鼎发掘山东城子崖遗址,确定以黑陶为主要特征的史前文明——龙山文化。通过比对辨识,另一位考古学家梁思永按时间序列勾勒出仰韶——龙山——殷商自下而上相互叠压的地层关系,即后岗三层墓。

值得一提的是,进入这一阶段,唱主角的已逐渐换成专业的考古学者。主持城子崖发掘的吴金鼎,是李济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时培养的学生。在哈佛大学攻读考古学的梁思永,则为在中国第一位接受完整训练的考古工作者。李济后来因公务繁忙,逐渐退出殷墟考古一线,梁思永遂成为实际主持人。正是他从错综复杂的地层堆积中明确了仰韶、龙山和商文化的叠压关系,证明中国历史相对连续、文化自成系列,从而有力地撼动了“西来说”。

1932年,安阳殷墟发掘报告荣获国际汉学界重要奖项“儒莲奖”,知识界一片欢腾。傅斯年认为“对外国已颇可自豪焉”,蔡元培更宣布“中国学”中心点已由巴黎转移至北平。这无疑是中国初代考古人奋斗的成果。

培养“接班人”:满天星斗的考古界

从1921年挖下“第一铲”到1932年获儒莲奖,十余年间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进步有目共睹。但李济深知,中国考古学起步晚,基础弱,绝不能沉醉于眼前的成绩,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才最重

要。而这件事,他早就布局了。

1925年吴宓筹建清华国学研究院,聘请梁启超、王国维、陈寅恪、赵元任为教授,并称“四大导师”,李济则为特约讲师。当时李济只有29岁,年纪轻、资历浅,却能与四大导师并肩开课,且拥有独立研究室,薪酬待遇也一致(月薪400大洋),足见吴宓眼界不凡。李济也是满怀憧憬而来。只可惜当时的人对考古毫无概念,加之李济初执教鞭,尚需摸索,不少学生听课如听天书,纷纷打退堂鼓。结果李济实际上只指导过“一个半”学生:“一个”即龙山文化发现者吴金鼎,“半个”是古文字学家徐中舒。

1928年7月,傅斯年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(简称史语所),下辖历史学、语言学和考古学三个组。中国素重史学,傅斯年却将考古与之并置,可谓破天荒。为何如此推重考古?因为在傅斯年看来,老派学者只知埋首故纸堆,“用文字做基本,就一物一物的研究。文字以外,所得的非常之少”。他呼吁学者走出书斋,“上穷碧落下黄泉,动手动脚找东西”,运用新方法、新工具,寻找新材料,重建中国史。

放眼彼时的知识界,配得上傅斯年野望的就只有李济了。李济也欣然领命,自此开启了他在史语所逾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。中国现代考古学总算有了自己的阵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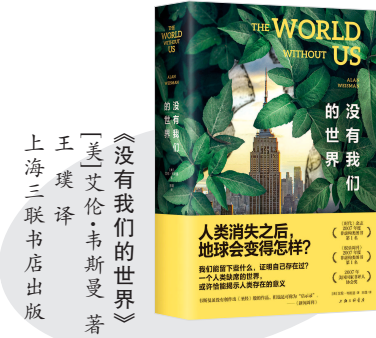
李济是这块阵地上无可争议的总指挥。梁思永是他力邀加盟史语所的,他还栽培李景琳、石璋如、胡厚宣等年轻人,即著名的“考古十兄弟”。抗战期间李济带着老父、妻女及史语所的文物、档案等流寓昆明等地。两个女儿夭折,李济怀着悲痛组织人手在西南调查挖掘,于烽火中推进考古事业。1946年他和傅斯年力荐夏鼐任史语所所长。夏鼐乃考古界后起之秀,论理属于晚辈,李济却乐得让位,其心胸可见一斑。

事实上,李济是将夏鼐当“接班人”培养的。只是世事难料,1949年以后,两人走上了人生的分岔道。李济在台湾大学创建考古人类学系,张光直、许倬云皆出自门下。夏鼐则成为考古学界的领军人物。1979年李济以83岁高龄逝世,中国现代考古学已然走出荒野。

当我读毕《荒野上的大师》和《李济传(修订版)》,仰望考古学的天空,看到的是满天星斗。

假如地球会说话:何不考虑做减法

■ 郭 莹



自2020年以来,人们不断从媒体平台看到这类新闻:城市出现野生动物,亦或是某地中心城区因无人打理生出荒草。疫情让艾伦·韦斯曼的《没有我们的世界》一下子从某种假设照进了现实。

与此同时,短视频平台的兴起,更是实证了“没有我们”之后会如何。在抖音、快手、B站等平台,有不少专门拍摄、直播废弃村庄的探险博主。通过他们的镜头,“我们”消失后的景观被呈现到每个人面前,愈发衬托出《没有我们的世界》的预言者气质。证明“有”相对容易,证明“无”则比较困难。作者艾伦·韦斯曼宛如博物学家,依靠大量材料描述“有我们”的世界给动植物和地球带来的影响,以此反推“没有我们的世界”到底会怎么样。

“人类消失的那天,大自然会接管这个世界,并立即开始拆房子,把它们从地球上彻底抹除,不留一丝痕迹。”大自然最有利的武器是水。韦斯曼对纽约城的未来深表忧虑。他认为“9·11”袭击也只

是影响了几幢大楼,比袭击更为恐怖且不可逆的,是大自然——“抹平城市的速度或许比我们所想的更快。”书中介绍了埃里克·桑德森博士的“曼哈顿计划”:他们试图将曼哈顿岛重建成1609年初次被人发现时的模样,以此来推测人类消失后的未来景观。在桑德森眼里,过去的曼哈顿就是未来的曼哈顿,是由森林、山丘以及到处流淌的水组成的。

纽约水务部门的主管们认为,雨水是大自然摧毁曼哈顿坚硬外壳的关键突破口。雨水的肆虐和人类活动具有直接关系。城市里的高楼大厦和沥青路面无法吸收降雨,又因为缺少植被覆盖不能使水蒸腾。每当暴风雨来临,无处可去的雨水只能涌向地铁,造成灾祸。城市安全被置于水泵之上,这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现代城市必须要面对的,各大城市近些年遭受的暴雨灾害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这一观点。如果这世界“没有我们”,也就意味着水泵们停止了工作。地下水不出两天就会淹没隧道,道路逐渐塌陷,分崩离析,植物的种子会夺回主权,占领所有角落。纽约可能会回到过去,到处都是森林与流水。这也是大部分人类城市会出现的景象:水毁坏一切而植物蓬勃繁衍。

塑料的长寿早已闻名遐迩。研究人

员曾将聚乙烯置于活细菌培养物之中,试图搞清楚降解塑料所用的时间,结果一年过去了,只有1%发生了降解。在陆地上,受到阳光照射,塑料分解得更快。但人们为了城市不被垃圾占领,会将大量塑料排放到海洋中。船长查尔斯·穆尔认为,到2005年,太平洋垃圾漩涡的面积已达到1000万平方英里,几乎与非洲大陆面积相当。

有些塑料是显而易见的,比如闷死海獭的啤酒包装袋、勒死天鹅和海鸥的尼龙渔网和钓线以及嗜住海龟的塑料袋。但更多塑料是看不见的,比如号称可生物降解的塑料袋,里面的纤维素分解后,留下了成千个透明的、近乎隐形的塑料颗粒。在普利姆河入海口随手抓起一把沙子,里面20%是塑料,至少包含30个颗粒。

塑料一旦进入到海里,降解速度更慢。“我们”灭亡后,由“我们”制造出来的塑料却会长久存活。人类目前还不知道塑料的具体寿命,因为“还没有塑料经历过自然死亡”。

“假如人类消失了,地球上会有至少三分之一的鸟类根本不会察觉。”多数动物的情感,人类根本读不懂。人类有所研究的诸如海豚、大象、鹦鹉等动物多半也不会怀念人类。人们一边保护它们,一边破坏它们的栖息地。据“过度猎杀假说”持

有者的说法,大约4.8万年前,每当人类到达一片新大陆,那里的动物就要倒霉。他们将其称为人类对动物的“大屠杀”。

韦斯曼预测:在非洲,“人类消失后,大象的数量将增加20倍”。海底生物也是如此,科学家昂里克·萨拉相信“假如一切人类活动随之停止……珊瑚礁能以比我们期望中更快的速度恢复到过去几千年的复杂状态”。虽然目前绝大部分海洋物种数量都很稀少,但生态学家杰里米·杰克逊相信海洋的强大:“如果人类离开了,其中多数都可以复原。”不过也有物种会为人类哭泣,比如头虱和人虱,以及毛囊螨。当然,寄居在人身上的200多种细菌可能也会不适应,在人类死后他们要马上“殉葬”。

书的后半段,韦斯曼严肃地研究起人类灭亡的可能性:“全人类一起消失的概率很小,很快发生的概率更小……所有生物都活下来、只有人类灭亡的概率还更小,但还是大于零。”

既然地球很难真的“没有我们”,这本书的环保主题也就自然而然显现出来了——原来“无我”并非科幻而是科普,其目的在于反衬“有我”之地球是怎样的糟糕。其中种种口述实录、科学调查以及研究材料,堪称环保主义者的辩论素材库,人们可以从其中轻易找到人类罪大

恶极的证据,读到最后,谁能不因自己身为人类而感到羞愧?

态度严谨、方法科学地指出人类对地球的破坏,当然有棒喝世人的作用,不过书中所述对应之法恐怕也只能从观念而非事实层面发挥作用。作者指出正是欧洲人购买鲜花的习惯,导致肯尼亚为了发展鲜花经济污染水资源,使周边动物苦不堪言。然而肯尼亚是非洲最大的鲜花出口国,该行业直接吸引超过35万肯尼亚人就业,间接雇佣了100万肯尼亚人,支持了300多万肯尼亚人的生计。这些人既然并不会凭空“消失”,而都要求生存谋发展,那么直到今天肯尼亚河流岸边还是会有因为鲜花保鲜剂而死的河马。

韦斯曼本人知道这种矛盾很难调和,所以也只好借这本书正告世人,正是人类才让地球疲惫不堪。这种警告比起跑进博物馆破坏世界名画,更加有理有据令人信服。然而我们现在面临的困境或许不是警告是否足够深刻,而是在全球资本化的今天,如何平衡人类不断增殖的欲望与地球有限的容量之间的矛盾。眼下人们的解决之道是做加法:用更高的技术解决技术带来的环境问题。

但如果地球会说话,它可能会说:“何不考虑删除一点什么?”

文化寻踪

中国景观的一种日式解读

■ 尧育飞

“中国的事物,无论是山、是水,还是天,在我看来都是风流的。”这是后藤朝太郎对中国文化的基本宣言。这位一生50多次前往中国的日本人,并不讳言自己对中国文化的极端热爱。

1918年至1926年,作为东洋协会大学教授,后藤曾20多次前往中国。他的研究也随之发生转向,他认为应当在传统经史及文学以外,基于文明史的角度去理解中国社会与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。从1927年直至1945年去世,后藤主要以“中国通”的面目出现在日本人面前,他不断告诫日本人,他们从前对中国的认识都是片面和不准确的。

《中国的风景与庭园》作为后藤认识中国的众多著作之一,为解读近世中国的风景提供了独特的“日式视角”。在欣赏中国风景、书写中国风光时,后藤始终不忘将日本作为观看的“视座”。然而,后藤心中每一次中日风景的较量,最终均以中国的胜出为结束。个中缘由,既有后藤始终坚持“中国文化至上”文化观有关,也受他“入乡随俗”沉浸式欣赏风景的理念影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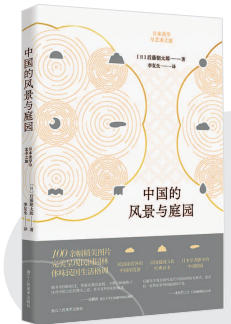
多次出入中日两国,后藤深知两国风景与园林的差异,但他从不曾故步自封于日本流行的风景观和庭园观中,反而高举“入乡随俗”的大旗,诚恳地拥抱中国人的审美世界。他说:“在评价中国大陆的风景之美时,当然不能以岛国日本的标准来考虑,中国各地应该都有各地自己的标准才是……笔者的话,则无论到哪里,都以入乡随俗为主旨,请当地人推荐当地最具特色的景致来观赏。”

后藤不仅如是言说,也在所思所行中严格实践。例如,后藤虽热爱日本传统的“青松白沙”的园林观念,但他深知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的园林精神并不一样,面对地大物博的中国,他以为“必须理解缺水是其主调”。对于中国的“废池乔木”,他竟也能捕捉背后的神韵。他深知,在论述中国风景时,不能单纯停留于风景之表层,必须考虑到中国史部、集部的文献记载及相关传说等等,唯有先行在胸中蕴育这些人文基础,方能窥得中国风景之妙。

由于抱有素朴而平等的欣赏理念,使得后藤对于风景没有狭隘的国别观,也不存在庸俗的占有欲。这种寄情山水的豁达姿态,颇得苏东坡《赤壁赋》中的齐物之妙。

人与自然和谐相生,是中国文化的奥义,在后藤看来,这也是中国风景和庭园令人迷醉的所在。书中,后藤多次使用“和谐”二字,他认为这揭示了“中国庭园的搭配秘诀”。不唯风景但论人,同样如此。后藤指出,中国文人虽热衷于装饰庭园,却从不将自己束缚于小小的四方天地中,而更向往与众人一道投入大自然的山水之间,那才是他们获得更为广阔的心情自由的秘诀。

以“自然”为根柢,置身于中国的风景,在中日文化与风景的比较中坚定“中国本位”的审美观,这是《中国的风景与庭园》所带来的三点基本启示。本书初版虽在近百年前,而作者于中国山水风景和庭园的精妙论断,仍时能引人思索,博人一笑。



《中国的风景与庭园》
[日]后藤朝太郎 著
李复生 译
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